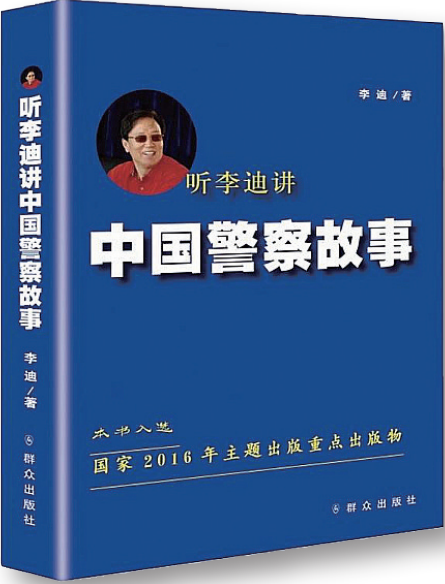


■书 评



《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寄到我家时,正巧我不在。爱犬大咖好像知道这是一部写警察的书,而其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警犬。于是,等不得我回来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打开了包装,取出厚厚的书,开始“品评”。结果可想而知,害得我又跟李迪要了一本,并把大咖“品评”的书还他并题记:“此为大咖首读,以牙齿为工具,欲成为警犬之功课。迪兄留念。

50年前初夏的一天,我13岁,经历毕业考前最后一次大提琴辅导。曲子不难,老师耐心示范着,但我心里长草,不想再练下去。老师焦急地问:“你懂了吗?再拉一遍。”自然这一遍没能让老师满意。多年后,在北京音乐厅再次遇到老师,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竟是:这曲子你懂了吗?

这也成了我听音乐的习惯,先是喜欢,然后会自问:这曲子你懂了吗?懂了多少?听到了什么?上世纪80年代初,广播里已经有了托赛利的小夜曲》、舒伯特的《摇篮曲》等古典音乐。父亲出差从广州给我带回双声道四喇叭音响,恰好赶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古典音乐调频立体声,所有的声音似乎都被放大或还原成那般美好。一个阴晦的冬天,暗夜风寒,听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我和同学说,那8个沉重的和弦从钢琴低音区滚出来时,我听到了伏尔加河冰雪消融,堤岸坍塌,冰水翻卷着俄罗斯人的苦难。同学说:“你看见了?哪儿来的画面感?”我愣住了。作曲家创作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疑问一直困扰着我。

30年前,终于等来3本音乐读物,时至今日它们都在我的书架上。一本是朗格著《19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一本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自传《见证》,再就是艾伦·科普兰的《怎样欣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丁少良译,叶琼芳校)。翻开书,科普兰开宗明义,“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欣赏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是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来听音乐的。不妨把这三个层次分为:(一)感官层次,(二)表现层次,(三)纯音乐层次。”显然,《小夜曲》之类的属于感官层面,抒情悦耳。而拉赫玛尼诺夫作品明显已经进入了表现层次。它无疑在表达着什么。当然这种表达见仁见智,企图用几句话来说明作品含义,自然没有那么容易。

重译科普兰这本经典读物,我既诚惶诚恐,也浮想联翩。想当初,对初听音乐的我们来说,总希望一首乐曲有一种指向性明确的含义,往往越具体,越喜欢,越觉得自己“懂了”。但是毕竟这样的音乐作品不多,以至于有的听众一旦在乐曲里听不到可以联系的具象事物,就怀疑自己缺少音乐欣赏力。按照科普兰的说法,这种机械的联系完全是本末倒置。按照作曲家的本意,哪怕像是《沃尔塔瓦河》这样明确的标题作品也应当作纯音乐来听,指向性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限制了作品表达的多义性。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已经不仅仅是好听与否,或者表达了某个具体对象,而是某种心理和情绪的感应:宁静或激昂、怅惘或得意、愤怒或喜悦。层次微妙,变化多端,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充分表达音乐的内涵。科普兰说,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家们只承认纯音乐的含义,也就是听音乐的第三个层次。尤其是面对全然没有标题的作品,比如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等,更需要在这个层面去聆听。在听的过程中会发现,三个层次其实很难分开:乐曲是否和谐,是否有某种情感的表达,以及作品在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技术构成完全是一体的。科普兰把聆听做三个层次的拆分,是为了便于听众的理解。以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为例,48首赋格曲的主调,每一首主调都反映了一个不同的感情世界。越是觉得美的主调,就越难找到满意的词来描述。你只知道大的情感走向,是欢快的还是哀伤的。若是进一步仔细品味哀伤的性质,是悲观的哀伤还是哀而不伤?是绝望的哀伤还是带着微笑的

李迪《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

用笔抒情到极致

□高洪波

殊可乐也。”

所以这样快乐,因为,40多年前我俩同在云南当兵。10年后,又一起回京。我到《文艺报》,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因为,他家有六只爱猫,也曾养过爱犬,惜过世。我们有同好。

李迪回京后,就开始了警察题材的写作。代表作《傍晚敲门的女人》很有影响,翻译到法国、俄国等多个国家,至今仍是公安文学的经典。近年来,他更是老当益壮,深入警营生活,写出了《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警官王快乐》《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等多部优秀作品,在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可以说,李迪为公安文学拿出了标杆之作。

现在,他的新书《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入选“国家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读后,我觉得有几点值得说说:

李迪的中国式的叙述策略非常好,精短如笔记小说。从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笔记小说的启发,如《世说新语》《聊斋》《阅微草堂笔记》等,全书故事没有一篇长的,短小而精彩,结构上非常体现匠心。李迪

的文风和讲故事的姿态特别真诚,风趣幽默接地气。这种接地气在我看来就是人民性的体现,心中有读者,眼里有人民,文风才会有这样的表现。李迪在自序里特别写到,他原来的文风是欧化式长句,后来受到古龙、汪曾祺的文风影响,短句子,快节奏,词贵浅显,浅中见才。他的结尾经常是戛然而止,余音绕梁,韵味十足。

《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是公安文化,或者说警察文化的特殊品种。在本届“两会”上,我代表文艺界发言,说的是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问题。文化自信的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革命文化,再有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觉得公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谈文化自信没有支撑法治社会的公安文化不行。李迪多年坚持写公安题材的作品,对公安文化有特殊的贡献。他是用以往不同的这一个,为我们当代警察画像,为他们的心灵进行造画,进而挖掘时代感和他们的英雄风貌。在书中,他写了片警、刑警、狱警、便衣警察,男警察、女警察,面非常广,是基层人民警察光辉的群像,很多篇幅

给读者的情感力度非常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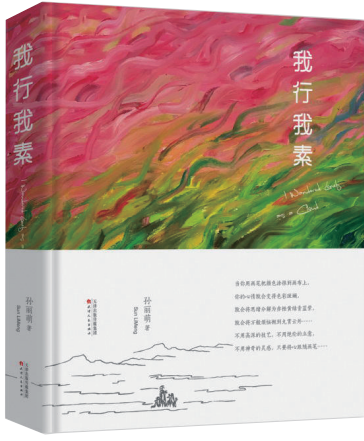
读李迪的这部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警察心灵贴近心灵。他投入心灵,收获心灵,最后是心灵与心灵的贴近。他对警察队伍的一腔热情让我感动。有的作家纯粹为了完成一个采访任务,完成以后就干别的去了。李迪不同,他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在同一个题材上反复进行采访,以他将近70岁的年龄进行采访,可是体力活儿,记录、追踪很辛苦,可是他乐此不疲。李迪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家,写过非常好的小说,现在又开始写报告文学,同样写得这样好。老骥伏枥,令人敬佩。

我开玩笑说,李迪是警界的情圣、公安的情种,用笔抒情到极致。他身入、情人、心入,笔下的警察个个写得神入化。他的作品不但受到读者欢迎,也受到影视界青睐。这部书中的警察故事,已经由两家影视公司在改编电视剧准备投拍。我相信,未来同样会赢得观众的喜爱,使我们的文化自信借助李迪这支笔达到新的高度,尤其是公安文化。

《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李迪著,群众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我以素颜行天边

□徐 剑



数年前,余行莽野之远,夜寒稀疏,大地皆寂,人歇歌难眠。见书架上有一部明人编《小窗幽记》,拾之夜读,竟不能释手。虽是旧时文人轩窗独倚,拂风兴至,吟花弄月,感命运多舛,遁入空空之短语、格言,竟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意境,令余挥之不忘。

余之鲁院老同学孙丽萌君,叠伏蒙古高原一隅,口吐莲花,酥手华章,佳作不断。然,自7年前文集出版后便悄然无声,不见文脉赓续。再聚首,未见其流露出宏伟计划与抱负。余思付,或也正逢暮春,落花流水,春去也。人过知天命之年,世间悲欢离合,一切皆已参透,何必要在文坛上拥旄西征,横刀立马,当个山寨女主。后,余乃知,彼已渐染雅痞,喜欢上了收藏,并与一些青年油画家混在一起,泼墨丹青,重彩山河。

丁酉鸡年元宵后,忽一日,孙丽萌邀余等去吃水饺,相见时抛出一语,令余为其文配图之著《我行我素》写一短序。随后,发来出版社样稿,百余幅之多,狂炸乱轰一番。余初不以

为然,匆匆翻过,因其短语集多似一盅心开鸡汤,便搁于案头。晚间,孙丽萌打来电话,询问阅读感受,我支支吾吾,不置臆否。彼秀发冲天,语调急切,哼!不上心,没有好好读!这可是我三年日志啊,或一事而感,或一物而伤,或一景而悟,或一秋而悲,或一人而哭,或一瞬而怅。决非与那些矫情之作同日而语。话已至此,余不得不认真拜读。

是日,北京天呈哈达蓝。余从玉渊潭暴走,夜归,浴毕。泡一壶六安瓜片,焚一炉檀香,伏案重拾《我行我素》。到底是坊间高人,文字老到、冲淡、空灵,观自在,见佛花开,悟道行空,思他人之未思,感苍生之未感,见哲人之未见,独语心灵,得明人《小窗幽记》真谛。余越读,越人佳境。再观书中插图,画与文可称绝配,完美诠释文字,画搭文之舟,文以画扩容,自然天成,延伸了说文感时悟道之空间和维度。余拍案叫好,打电话问孙丽萌,画作是否据其文而作。彼道,非也,完全是根据画境,截文配图。佳配啊,余感叹道,堪称心有灵犀、文画共鸣啊。孙丽萌在电话那边颇有几分得意,道,彼与多位画家相交十载,几乎成了忘年交。尔辈皆丹青高手,神游漠北,心驰高原,安心作画,每每有新作,一批固定收藏家便趋之若市,不为稻粮谋,盖生活无优矣。而孙丽萌为其策展,在炎黄艺术馆登场,尔等感激不尽。

始,余对《我行我素》书名不无微词,以为丽萌君片警出身,作家名世,谦卑之辈,并非疏狂之士。后细想,妙哉!岂有文章览天下,我以素颜行天边。文与画,若抵我行我素之境,乃天马行空也。

《我行我素》,孙丽萌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人书情缘

□林金豪

世间缘万种,相遇方式各有差异,带来的惊喜或温暖的体验却多相似。《书海扬铃录》便是由奇妙的情缘线编织而成的书话体散文集,作者沈津用平实而饱含真情的文字将点滴情缘铺陈开来,笔墨生香。

“浮生愿向书从老,不惜将身化蠹鱼。”沈津的“书福”可谓不浅。作为一名版本目录学家,他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过眼的书,尤其是古籍善本类绝不在少数。做这一行的,要想培养出过人的鉴别能力,必须要多看多对比,并善于思考归纳。大凡讲中国书史,一些学者在谈及元刻本时多认为其显著特点之一是赵体字,即元代刻书字体类似赵孟頫,但沈津却以为不完全是这样。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举出大量实例,对不同的元刻本作比较,认为元代刻书的字体大致可以分成赵体、宋体、匠体、仿宋体等几类,不可一概而论。其博学和细致严谨的考证态度不禁让人折服。

作者回忆,《书城挹翠录》是其处女作,其中收录了一些他此前过眼的罕见善本书。因为这种书的读者面不广,为了将其出版,作者便倒贴了钱,却未曾料到印得不多的书竟很快售罄。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瞿翼良还特意来信附上一张勘误表,看得自己“心惊肉跳,羞愧之极”。后来,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为这本书,他携家小奔赴美国,在哈佛燕京图书馆18年,

每日以3000字左右的工作量伏案写作。当时在该馆工作的戴廉赠词:“经一篇,史一篇,书志撰成百万言,小楼人未闲。风一天,雪一天,废寝忘食志不迁,世间难此缘。”这样浩大的编写工程背后的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对于沈津来说,这也是一个能接触大量书籍的绝佳机会。生活虽略显单调,可只要有书作伴,“老蠹鱼”仍是乐在其中。

一直以来,让沈津引以为豪的是师从顾延龙、潘景郑和瞿凤起三位大家。在上海图书馆的30年里,顾延龙严格要求翻善本、做记录、练毛笔字等,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作者打下了扎实的版本目录学基础,在做人方面,几位先生更是以身作则,他们“待人接物谦虚谨慎,不摆架子,不张扬,也从没发过脾气。问他们什么,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沈津爱和书打交道,也因对书籍的一份赤诚之心结识了众多爱书人士,以书为师,以文会友。他们之中有学界大师如徐森玉、昌彼得、饶宗颐等前辈,还有民间收藏家如林章松、韦力、田涛等好友。沈津写下他们交往中的趣闻轶事、谈话点滴,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他们,进而体会潜藏在这些人士所作所为背后的那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期盼大众能看见这个复杂时代里的文化良心。

《书海扬铃录》,沈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瑞典]喜仁龙著,邓可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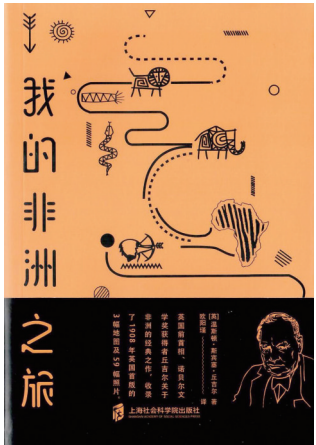
1920—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激荡在古老的北京城。精神形态的老北京,经历着革故鼎新的剧变。物质形态的老北京,却满披沧桑衰朽之迹,肃穆依然:内外城轮廓齐全,一座座城门形制完整。置身其间的居民们,当时大概谁也没想到,将来的北京人还会有怀念这些老城墙和老城门的一天。可能正因此,对20

年代初期北京的老城墙和老城门的状况,做了详细记录和生动描述的这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出自一位专程来寻访中国都城建筑之美的外国人——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wald Sirén)。

北京古城的城门和与之相连的城墙,以及由这些城门和城墙延伸、分隔开来的街道和园林,构成了一个深深吸引作者的人文历史意义上的美的整体形态。为了详尽记录这种深切的美感,作者全面地调动了他身为艺术史研究者的各种专业素养。他反复细致勘察了北京城门和城墙的各处现场,尤其留意和分析嵌入城墙和城门墙体的碑铭砖刻,因为那上面留着明确的建筑信息。此外,为把有关北京城墙和城门修建、改造的历史沿革和构造形式变化彻底了解清楚,作者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这个过程中,作者请教和求助了许多中国师友。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砖刻碑铭拓片的,是他的中文老师周谷城先生;为他翻译地方志的是培华女校的外教包哲洁女士。而穿插在书中的五十多幅城门和城墙的形态图和结构图,又是经国际友人介绍来的中国画师,遵照建筑师和作者的具体要求,按严格的比例和精准的尺度绘制成的。除了这些,作者还在书中附了他亲手拍摄的百余幅北京城门、城墙的清晰照片和少量作为参照的西安和山东青州的老城门和老城墙照片,留驻了难以再现的珍贵历史风貌。

全书八章,每一章都写得结实扎实,并且优美流畅。第一章概述中国北方筑墙建城的历史;第二章回顾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第三章综述北京内城城墙;第四、五章依东北西南之序,分别介绍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第六章介绍北京外城城墙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第七章分四节,依次介绍内城四面的城门;第八章介绍外城城门。各章首尾都是优雅、洗练的散文笔致的场景刻画,隐含着趋近而又走远的行踪,和选准风光韵味最足的时刻或季节的独特视角。从容展开的建筑流变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梳理、讨论,一概放在各章中部。但即使是在交代这些很容易让读者觉得生冷铁硬的专业内容时,也常会跃出些灵动鲜活、诗意盎然的片段:“城门的魅力和个性,随着季节和光线不断变化,但夏季无疑是它最绚烂迷人的时节。高大的垂柳俯下身子,绿色帷幕般的枝条几乎贴到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椿树的树叶则轻抚着城墙。孤独的行者骑着驴穿过这座城门,昏昏欲睡。这里的空气沉向向的,布满尘土的道路和石桥被太阳烤得炽热。人们都尽量避免走动,除了一群被晒得黝黑的顽童,他们在浑浊的护城河水中与白鸭一起扑腾、嬉闹。这是一幅北京夏天的缩影,因为有了这座古老的城门,衰落的城市和恬静的乡村被美妙地联系起来。”(引自第八章,见该书第179页)

《我的非洲之旅》,[英]丘吉尔著,欧阳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依作者在前言所说,书中各篇都是他在完成当天行程后,利用一个个漫长而炎热的午后写出来的。而通读全书,可以从诸多细节知道,丘吉尔的这趟非洲之旅,几乎时刻都面临疫病、蚊虫、暴晒、海拔等多方面威胁对身体健康和安全的考验。一路上,壮美的自然风景、奇特的种族风情,始终与作者隐隐的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提防相伴随。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影响作者书写这部旅行记的热情。遍布全书的各种画面感极强的描写,表明作者对他所到之处都有耐心的观察和全身心的投入。或许这正是因为职责所迫、使命在身。或许这正是作者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种写作能力的体现。

起于东非东南角的印度洋边的蒙巴萨岛,沿乌干达铁路向西,经内罗毕至维多利亚湖,又到恩德培和坎帕拉,再顺白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东非北部的苏丹喀土穆,这趟几乎纵贯整个东非的长途,仅看它标在地图上的线路,就够有气派。对此,丘吉尔用毫不吝啬笔墨的状物和写景,有力地呈现了它应有的分量。而行至内罗毕、恩德培、坎帕拉、喀土穆这几座政治中心城市之际,他也适时地好像触景生情似的,探讨起了如何针对东非特殊的社会、人文和地缘条件,实行更有效、更合理,也更符合英国利益的殖民政策等严肃政治问题。

还是干脆利落而时带诙谐的文风,还是惯以具体的事例代替烦琐的思辨,坚定的政见主张、开阔的世界视野和顽固的帝国立场、狭隘的种族偏见,却明暗相间着,一股脑儿都流露了出来。这显见得时代、国族和文化的局限,同时也显见得写作者个人的坦率和诚实。